

国学大师

陈寅恪

刘以焕 著

重庆出版社



94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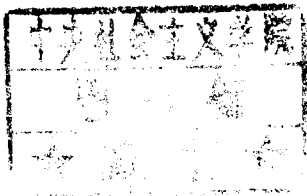
K25.8  
41

# 国学大师陈寅恪

刘以焕 著



\*200427065\*



重 庆 出 版 社

1996年·重庆

(川) 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陈晓文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刘忠凤

刘以焕 著

**国学大师陈寅恪**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5 字数 268 千

1996年2月第一版 1996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

ISBN 7-5366-2419-0/K·136

定价: 16.80元

书中，除传主陈寅恪在其姓或名下有“先生”字样外，其他人多不加“先生”或其他称谓，非不敬也，只为行文简洁而已。

作者谨启

# 目

# 录

|          |         |
|----------|---------|
| 琐尾流离——弁言 | ( 3 )   |
| 国宝佳话     | ( 12 )  |
| 家世渊源     | ( 18 )  |
| 家世煊赫     | ( 18 )  |
| 客家人氏     | ( 19 )  |
| 六代家世     | ( 22 )  |
| 家学承受     | ( 75 )  |
| 负籍域外     | ( 86 )  |
| 清华育人     | ( 113 ) |
| 八年离乱     | ( 174 ) |
| 岭表蛰居     | ( 238 ) |
| 学养渊广     | ( 301 ) |
| 多识奇字     | ( 301 ) |
| 国学巨擘     | ( 306 ) |
| 梵西两学     | ( 307 ) |
| 旁通淹识     | ( 311 ) |
| 成就卓越     | ( 315 ) |
| 西北史地     | ( 317 ) |

|                    |         |
|--------------------|---------|
| 蒙藏绝学.....          | ( 318 ) |
| 天竺影响.....          | ( 320 ) |
| 中古文史.....          | ( 323 ) |
| 新兴学科——敦煌学、突厥学..... | ( 324 ) |
| “书...写红妆”.....     | ( 326 ) |
| 史学二陈.....          | ( 329 ) |
| “续命河汾”.....        | ( 331 ) |
| 诗本唐宋.....          | ( 332 ) |
| 方法精进.....          | ( 335 ) |
| 严谨科学.....          | ( 335 ) |
| 巨视细察.....          | ( 336 ) |
| 比照参析.....          | ( 339 ) |
| 诗文证史.....          | ( 339 ) |
| 考对对子.....          | ( 341 ) |
| 书末附记.....          | ( 346 ) |
| 编年著目.....          | ( 350 ) |
| 引文要目.....          | ( 360 ) |

# 琐尾流离——弁言

“琐尾尾兮，  
流离之子。”

——《诗·邶风·鳧丘》

“琐尾”表示少好之貌；“流离”为鸟，“少好长丑，始而愉乐，终以微弱”。此“云卫之诸臣，初有小善，终无成功，似流离也”。后来以此喻处境初时顺利，转而艰辛。古希腊哲人亚理斯多德说过：“……悲剧……或由顺境转入逆境，……”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境遭，初时顺利，转而艰辛，无疑是一场悲剧。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八十载的经历，正是“琐尾流离”，从顺境走入逆境，无论从人生，从学术，从时代各方面来审视，真是悲剧一出！寅恪先生的高足蒋天枢在他的《陈寅恪先生传》接近末尾处写道：

“综观先生一世，屯蹇之日多，而

安舒之日少。远客异国，有断炊之虞。飘泊西南，备颠连之苦。外侮内忧，销魂铄骨。寄家香港，仆仆于滇越道之中（在重庆有‘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之谐语）。奇疾异遇，困顿（失明而无伴护）于天竺、英伦、纽约之际。虽晚年遭逢盛世，而失明之后，继以挨足，终则被迫害至死。天之困厄斯人抑何酷邪？先生虽有‘天其废我是耶非’之慨叹，然而履险如夷，胸怀坦荡，不斤斤于境遇，不戚戚于穷困，而精探力索，超越凡响，‘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忧国忧民之思，悲天悯人之怀，郁勃于胸中，壹发之于述作与诗歌。先生之浩气遁矣。”

（引自《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9）

蒋先生上述这段话确乎概括了寅恪先生的大半生的际遇及学术精神。

寅恪先生晚年撰《柳如是别传》，对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一词感怀至深。他写道：

“复次，昔时读河东君此词下阕‘春日酿成秋日雨，含啼风流，暗伤如许。’诸句，深赏其语意之新，情感之挚。但尚未能确指其出处所在。近……始恍然悟河东君之意，乃谓当昔年与几社胜流交好之时，陈宋李诸人为己身所作春国风雨之艳词，遂成今日飘零秋柳之预兆。故‘暗伤如许’也。‘酿成’者，事理所必致之意。实悲剧中主人翁结局之原则。古代亚力斯多德论悲剧，近年海宁王国维论红楼梦，皆略同此旨。……”



寅恪先生以亚理斯多德悲剧理论分析《咏寒柳》词，是以此自况，因为他晚年最不能忘怀的是从前与友人自由切磋学术的旧情。《咏寒柳》全篇都是表现对往昔交游的追忆与感伤，寅恪先生正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古希腊悲剧结构，其一是从顺境转为逆境，即琐尾流离，这也包含着学人与同仁的学术交流；往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今却……寅恪先生能不“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么？

寅恪先生曾自谓：“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先生生于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当然是清帝国之民。至于“死作共产之鬼”，则是讖语（先生1969年歿）。这几十年，数度改朝换代：从清帝国到民国，再由民国到人民共和国。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如何立身处世，寅恪先生有极其精辟的论述：

“纵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

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元白诗笺证稿》，页8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从先生这一段论述中完全可以窥测他本人的好恶，也就是他的道德标准与价值观念。他十分鄙薄那些士大夫，即知识分子，以二重人格左右逢源。他对之深恶痛绝，称之为“不肖者巧者”。我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当代史几个时期的交替，“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这是先生的夫子自道，“常感受痛苦”矣。这也是由顺境转入逆境，琐尾流离。

寅恪先生博闻强记，掌握与通晓无数种语文，其中有些还是已消亡的语言文字，如域外的梵文、域内的西夏文等；他学识渊博，精通我国历史学、古典文学和宗教学等；先生关于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及明末清初的文学及内典的著述，尤为精湛，学术价值极高，这些都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推重。有关这些，已有不少人进行过研究，但对他的学术精神，价值取向，却接触得不多。寅恪先生的挚友吴雨僧曾说先生“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由是可知，先生并非埋头书斋寝馈于中外典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笔耕舌耘的学人，而是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卧龙式的人物，极有正义感。和寅恪先生在清华共事的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给先生的侄子陈封雄的一封信中写道：

“……令叔不是书虫，是正义感非常之强的学者。兹就记忆所及补充一事：很早的时候，记不清是那年，在清

华的一次教授大会上，他当校长曹云祥的面，要求曹辞职。”

（陈封雄：《“怪”教授》，载《人物》1983年第4期）

1919年末吴雨僧曾记下寅恪先生“纵论中西印文化”的谈话。陈氏说：

“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这里所说的“精神之学问”，就是陈、吴二位所谓的“道”。20世纪以降，在域内学人们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实用的，具体的，有效的，即急功近利这个方面，以便匡时济世。但是“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最不适用”。陈吴二氏所倚重的“精神之学问”，也就是他们所重的“道”，是与当时的潮流背向的。他们两人所倡的“精神之学问”是对于永恒的、超越价值的信仰，在以“主义”为思潮的期间，认为这“不切世用”，不仅引不起人们的重视，无人问津。在这样的境地里，寅恪先生只得将“精神之学问”看作“学问之精神”。于是他潜心学问，以此来求索心中的“道”。这样的潜心学问，是寻找精神寄托。但要潜心学问，就如前人所谈“治学先治生”。于是寅恪先生有这样的议论：

“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

案。要当于学问与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

（《吴宓与陈寅恪》，页8—9，清华大学

出版社，1992）

“切莫以为陈寅恪真的主张学者经商，实在他是不愿意看到他奉为终极价值或‘道’的学问变成庸俗的手段。……将谋生的‘术’与追求的‘道’分开，以经商维持生计，以学问维系精神。”（葛兆光：《“吾侪所学关天意”》，载《读书》，页7，1992年6月号）吴宓指出寅恪先生一生坚持“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并坚持“不从时俗为转移”。这正表明了他对“精神之学问”的心迹。

寅恪先生执着追求“精神之学问”，对实用的、短视的中外文化中的弊端是有所批判的。在吴宓先生的日记中有以下一段话语：

“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

于是寅恪先生发出“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而常人未知通晓，未之查觉……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而将实用主义理论输入中国的胡适，却对佛教没有好感。由此可见“精神之学问”与实用主义的理论是殊途的。

寅恪先生倡“精神之学问”，藉此经时济世。但他入世以后，实用主义风行一时，于是正如吴宓诗所云：“飞扬顿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尽管寅恪先生也有“吾侪所学关天意”以自诩，但世违“天意”，“所学”何用？那么就只有“吾道孤”了。寅恪先生的悲剧就在于此。从“吾侪所学关天意”起始，进而“吾道孤”，难道这不是“从顺境转入逆境”的悲剧么？正所谓“琐兮尾兮，流离之子”。

寅恪先生与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共事。他俩相契甚深。陈对王十分尊重，自谦为“鰥生”。1926年北伐军兴，节节胜利，逼近北京。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自沉昆明湖。1948年底，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12月15日陈寅恪先生携家眷乘坐国民党派来北平的专机出走，辗转去了广州，先在岭南大学，后转入中山大学执教。王、陈二氏，一则遽尔轻生，一则突走，原因安在？冯芝生（友兰）在1989年11月11日撰写了《怀念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页18—1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对王的“自沉”，陈的“突走”，作了参析印证：

“静安先生与寅恪先生为研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两学者，一则自沉，一则突走，其意一也。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意亦一也。一意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

冯氏为何将“花落春意亡”比况静安先生之自沉与寅恪先生之突走呢？其中有一故实：晚清俞樾应试，在卷中有一句诗为“花落春仍在”，深得座师曾国藩赏识，俞得以中式。俞以此自诩，命所居为“春在堂”。为何曾国藩激赏这句诗呢？因为诗无达诂，就强作解人：曾国藩反对太平天国，认为太平天国是名教（广义指中国传统文化）之“奇变”，即太平天国是以西方之基督教毁灭中国传统文化。是时，曾国藩也审时度势，主张引进西方科学与工艺，使之服务于传统文化，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即借俞樾诗表达自己的情愫：“西学为用”，即中学之地盘必然不少被西学所占去，以此比喻“花落”也；而“中学为体”则是“春仍在”也。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道：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必安而义尽也。……”

（《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页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此言道出了王自沉的原因，亦为寅恪先生21年后从北平突走设下伏笔。寅恪先生撰写《挽词》时正执教于清华，是时乃是先生学术生命的颠峰时期，正处于顺境。然随即日寇入侵，继而西南转徙，再岭表流寓，于是“转入逆境”，“流离之子”啊！

“综观先生一生，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失明之

后，继以槓足，终则被迫害致死。”上述这些，大都局限于肉体上的痛苦，然“先生之浩气道矣”，就完全能支撑得住。就以失明为例，先生“然脂瞑写”，“著书唯剩颂红妆”，就有《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都九十余万言，其余著作还未计算入内。目盲之后仍著述者，域内外不乏其人。如明清之际的唐汝询，五岁失明，然而他耳濡“诸兄占毕之声，就默识之，积久不忘”，著《唐诗解》、《编蓬集》、《姑蔑集》等。钱牧斋认为汝询的著作颇有新意。晚清民初的朱克敬香荪也是瞽人，撰写有《瞽庵杂识》。又如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成瞽人之后，写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精神上的折磨比肉体上的痛苦则是更大的悲剧。先生笔耕口殫终身，但他的著作却难于付梓，于是喟然叹曰：“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剩有文章供笑骂”。先生从清华育人开始，直至南迁岭表以后，都在“传道、授业、解惑”，义宁陈门的桃李可谓多矣。但是在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开始。运动中先生受批判，遂不再教课”。先生“‘续命河汾’之向往”，就付诸东流了。先生虽然有“留命任教遭白眼”的喟叹，但也有“老来事业未荒唐”道劲的浩然之气。1961年7月吴宓从渝州专程到穗访寅恪先生。在吴宓1961年8月30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丝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转引自《陈寅恪先生年事辑》页158）

先生恪守不移，老而弥坚，至死不变。但这是“从顺境转入逆境”、琐尾流离的性格与人生悲剧。

# 国 宝 佳 话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

——《荀子·大略》

“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墨子·亲士》

将十分杰出的人才称为“国宝”，是古今皆然的。寅恪先生荣膺这个称号，是当之无愧，理所当然的。1962年8月10日在大连创作座谈会上，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一。（按，此记忆偶误，散原老人①少年时，与丁慧东、谭翻同、吴宝初



四人，时称四公子）……”周扬所说“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未必确切。在国民党时期，寅恪先生的学术地位的确很高：曾在好些所国立大学或著名的私立大学任教，而且还兼任过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实际只担任名义，遇有学术问题才应邀参预），又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曾到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蒋介石曾宴请到会诸先生，寅恪先生初次见到蒋。但没见到国民党称寅恪先生为“国宝”的记载。不过在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今圣叹（程绶楚或程清宇的笔名）写过一篇名为《国宝云亡》。文中有云：（寅恪）“先生在战时应牛津之特聘<sup>②</sup>，主讲东方汉学，全欧汉学家云集于奥格斯佛城，女史家陈衡哲评之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人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此评不为时人知，余战后在上海中研院办事处后住宅中，亲闻于衡哲女士者。”（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页108—109）臆测，国民党称寅恪先生为国宝，原因大概出于此，今圣叹写的文章《国宝云亡》就有“国宝”二字。但这并非来自国民党官方。

称寅恪先生为“国宝”应在1949年后。有关于此，贝司撰写过一篇题名为《一面之缘——回忆陈寅恪先生》（载[港]《明报月

① 散原老人是寅恪先生的尊翁。清末四公子者，即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嗣同；湖南巡抚江西义宁陈宝箴之子三立（字散原）；广东水师提督安徽庐江吴长庆之子保初；福建巡抚广东丰顺丁日昌之子惠康。或又谓无丁惠康，而有陕甘总督浙江嘉兴陶谔之子葆廉，然谭陈则必在其列矣。

② 按：此处似有误，或应是剑桥之聘。寅恪赴英途中，滞留香港，并未到达英伦。有关于此，在此不赘，后详。